

“五四”前后周作人与李大钊往来考

——以《周作人日记》为中心

王 玉^{1,2}

(1.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 校刊编辑部, 上海 200233; 2. 红色经典大众化与推广研究中心, 上海 200233)

摘要:《周作人日记》有许多关于李大钊的记录。在 1927 年 4 月 28 日李大钊牺牲之前, 周作人在日记中一共记录了 45 条与李大钊有关的内容, 其中, 1919 年 22 条, 1920 年 18 条, 1921 年 3 条, 1922 年 2 条。1923—1927 年无相关记录, 李大钊牺牲后, 《周作人日记》中再次出现关于李大钊的记录。从以上统计中可以看出, 李大钊与周作人的交往时间只维持了短短的 4 年, 交往频次呈递减趋势, 而且后两年交往次数更是断崖式下跌, 以至最终断了往来。“五四”前后周作人与李大钊这段人生轨迹的短暂交集, 可以用北大同事、新文化运动健将、新村运动的同志三个方面来概括。

关键词:周作人; 李大钊; 周作人日记

中图分类号:B2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49X(2019)05-0025-08

DOI:10.16160/j.cnki.tsxyxb.2019.05.004

Study on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Zhou Zuoren and Li Dazhou Around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Based on Zhou Zuoren's Diary

WANG Yu^{1,2}

(1. Journal Editorial Department, Party School of Shanghai Committee of CPC, Shanghai 200233, China;

2. Research Center for Popularization and Promotion of Red Classic, Shanghai 200233, China)

Abstract: In *Zhou Zuoren's Diary*, there are many records about Li Dazhao. Before Li Dazhao's death on April 28, 1927, Zhou Zuoren had written 45 articles related to Li Dazhao in his diary, of which 22 were in 1919, 18 in 1920, 3 in 1921 and 2 in 1922. There were no relevant records from 1923 to 1927, and after Li Dazhao's death, the records about him appeared again in the Diary. From the above statistics,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Li Dazhao and Zhou Zuoren only lasted for 4 years and the frequency tended to decrease. During the last two years their communication dramatically declined and finally came to the end. The transient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m could be summed up in three aspects: colleagues in Peking University, leading members in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and comrades in the New Village Movement.

Key Words: Zhou Zuoren; Li Dazhao; *Zhou Zuoren's Diary*

基金项目:上海市党校行政学院系统 2017 年度课题

作者简介:王玉(1983—),男,安徽枞阳人,编辑,硕士,主要从事新文学史料、党刊研究。

周作人是一位散文家、翻译家,但在抗战时期有附逆的污点。李大钊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们两位的人生道路可谓大相径庭。然而,周作人和李大钊的人生轨迹曾经有段交集,这段交集就发生在“五四”前后。当时,周作人和李大钊同在北京大学任职,有段时间还过从甚密。本文主要通过爬梳《周作人日记》^①等相关史料,考证同属新文化运动阵营的周作人与李大钊在“五四”前后的交往过程。

一、北大同事

周作人(1885—1967)比李大钊(1889—1927)年长4岁,两人早年都曾留学日本。周作人是1906—1911年在日本法政大学(预科)、东京立教大学学习。李大钊是1913—1916年在东京早稻田大学学习。当李大钊留学日本的时候,周作人已经回国,但两人入职北京大学的时间相差无几。周作人是1917年4月进入北大附设的国史编纂处,同年9月任文科教授。李大钊是1917年12月到北大图书馆任职,1918年1月任图书馆主任,同年2月兼任经济学教授。两人进入北大时,北大本身也处于一个历史转折点。1916年12月,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对北大进行改革。用周作人的话说,“我于民六到了北大,那正是文学革命与新文化运动的前夜”^{[1]271}。在北大教员中,周作人、李大钊同属于支持新文化运动的新式知识分子。

他们之间是何时开始接触的?周作人晚年在《知堂回想录》中说:

“我认识守常,是在北京大学,算来在1919年左右,即是五四的前后……那时我们在红楼上课,下课后有暇即去访他。为什么呢?《新青年》同人相当不少,除二三人时常见面之外,别的都不容易找……在一院即红楼的,只有图书主任,而且他又勤快,在办公时间必定在那里,所以找他最是适宜,还有一层,他顶没有架子,觉得很可亲近,所谈的也只是些平常的

闲话。”^[2]

其实,周作人与李大钊的相识应该比这还要早一些。据《周作人日记》记载,1918年11月27日下午,周作人“至学长室议创办《每周评论》”。此处“学长”,指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当天,李大钊也参加了这次会议。换言之,至少此时,周作人与李大钊就已经认识了。

但周作人与李大钊真正开始往来,的确是在五四运动前夕。1919年3月22日,周作人在日记中写下“访李守常”。这是《周作人日记》第一次出现李大钊的名字。周作人郑重写下了李大钊的全名“李守常”,这也说明两人刚交往不久。因为周作人在日记中从第三次开始提到李大钊时都简称“守常”。

在《周作人日记》中,“访李守常”“访守常”一共出现了20次,说明两人交往中,周作人是积极主动的一方。关于地点,记录多是“往校”“至大学”“往北大”“至文科”,说明两人见面地点主要在北大,具体来说是在北大图书馆的李大钊办公室。

李大钊办公室在北大红楼,《李大钊年谱》有详细说明:

“1918年10月,图书馆迁往新址——北京沙滩大街路北的那座四层的红砖大楼即北大第一院。红楼的第一层,主要作图书馆之用,分为二十一个书库,六个阅览室。都是经过大钊同志亲手安排的。东南角上一连两间的房间,为图书馆主任室。外间作会议室,内间作主任室。”^[3]

周作人在回忆录中说两人只是“谈些平常的闲话”,但从日记来推断,谈话内容远不止于“闲话”,这将在下文展开论述。而且,周作人到李大钊这里来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借阅新近出版的各种报刊。如,1919年10月31日,周作人“从守常借《劳动》杂志合本一册”;11月10日,“还守常《劳动》一本”。《劳动》杂志是一份月刊,主编吴稚晖,1918年3月20日在上海创

^① 《周作人日记》(影印本),大象出版社,1998年。

刊,由大同书局发行,同年停刊,共出5期。它主要宣传无政府主义,曾介绍蒲鲁东等无政府主义者的生平、思想和学说,也报道国内外工人阶级的劳动和生活状况、工人运动的情况,它同情工人的处境,支持工人同盟的罢工斗争,但反对工人参加政治活动^[4]。1920年5月7日,周作人“往大学,访守常,取来《日华公论》五月号一册”。《日华公论》是一份日文周刊,1912年11月由日本人森川照太在天津创办^[5]。《北京大学日记》显示,北大图书馆当时藏有《日华公论》^[6]。

从《周作人日记》可以看出,李大钊也有一次主动去拜访周作人,那是1921年7月21日。当天,李大钊和钱秣陵等人一起拜访了周作人。值得一提的是,李大钊并非去北京西直门内八道湾11号拜访周作人。1921年6月2日至9月21日,周作人在香山碧云寺养病^[7]。因此,李大钊是去香山碧云寺看望周作人。周作人与李大钊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22年9月18日,当天周作人去北大,顺便拜访了李大钊。

除见面谈天外,周作人与李大钊书信互动也很频繁。在《周作人日记》中,周作人、李大钊之间书信往来(以“函”为关键词)共出现了14次。其中,周作人寄信7次,收李大钊信7次。而且,这7次通信并非全部是一一对应的收信、回信关系。换言之,他们二人之间的通信数量是大于14这个数字的。比如,1923年1月,李大钊致函周作人,约同赴武汉讲学:“接胡小石先生由武昌来函,云寒假时当地教职员会拟组织一学术讲演会,嘱转请吾兄及爱罗先珂先生联袂一行。”^{[8]201}不知什么原因,周作人这次没有成行。李大钊致周作人这封信,在《周作人日记》中就没有反映。据《鲁迅全集·日记》,1921年8月28日,鲁迅“代二弟(即周作人——笔者注)发寄李守常信”^[9],当时周作人在香山碧云寺养病。此外,1920年元旦前夕,两人还互相寄赠贺年片。

二、新文化运动健将

北大是五四运动的大本营,周作人和李大钊两人都是北大教职工,但这并不意味着两人

天然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风云人物。周作人与李大钊能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健将,与他们接受的新思想有关,更与他们积极参与五四时期报刊及社团活动密切相关。

第一,二人是《新青年》的同人,也是此刊的重要作者。1917年1月,陈独秀接受蔡元培邀请,由上海北上,出任北大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也被陈独秀带到了北京。1918年1月,《新青年》从第4卷起改为同人轮流编辑。从第6卷开始,李大钊加入编辑队伍。在李大钊任编辑的6卷5号(即“马克思研究专号”,1919年五四运动后出版)上,刊有周作人(署名起明)的《俄国革命之哲学的基础(下)》。此文是下篇,上篇刊于《新青年》6卷4号。该文原著者是英国 Angelo S. Rappapor,原刊于1917年7月《The Edinburgh Review》杂志。1919年3月31日,即“五四”前夕,周作人翻译了这篇文章。关于《新青年》,《周作人日记》中有不少记载,其中一条是:1920年12月16日,周作人“往大学,访守常,(下午)四时回家,得《新青年》十册”。

第二,李大钊是《每周评论》的创办者,周作人是支持者。1920年,周作人(署名鹤生)在《亦报》上发表《北大的史迹》,文中回忆了《每周评论》的创办过程。周作人说:

“五四时候(北大图书馆)主任的李守常,那时的主任室的情形我还记得清楚,并不是记性好,四十年前的事情都能记忆,实在乃是因有特别缘故,那一年的春天大家觉得《新青年》是月刊,太是迟缓,需要一个周刊来主持言论,便在那房间里会议,决定发刊《每周评论》,在五四时很发挥一点力量,但出了三十六期就被禁止了。

平时下了课有点余暇,多到那里去坐,李君很有思想,人又长厚,总在朝南的窗下一张办公桌前坐着,我们先去的便坐在西边的安乐椅上,谈上几十分钟的天,好些人都来访他,记得在他那里遇见的,有章行严的夫人吴弱男,任叔永的夫人陈衡哲等人。”^[10]

周作人这个回忆也有点不准确,《每周评论》创刊于1918年冬,具体日期是12月22日,

而不是“那一年的春天”。至于创刊动议则更早,这在《周作人日记》中有记载:1918年11月27日下午,“至学长室议创办《每周评论》,12月14日出版,每月助刊资3元”。《周作人日记》显示,1919年3月22日,“访李守常君,交杂志会费二元六角”。此处会费,疑指《每周评论》助刊资,但由于数额与之前记载不一致,因此尚不能断定。1919年6月6日,周作人“又至文科访守常,交《每周评论》稿”。周作人这篇稿指《前门遇马队记》,署名仲密,在五四运动爆发一个月后的6月8日发表。周作人后来表示,“五四”是件顶重大的事^{[1]715},“六三”乃是“五四”的连续^[11]。他这篇文章,讲的就是北京“六三”事件。

第三,李大钊是少年中国学会的发起人之一,周作人为《少年中国》的撰稿人。周作人与少年中国学会发生关系是因为李大钊。1918年6月30日,王光祈、李大钊等7人在北京发起组织少年中国学会,李大钊任临时编辑部主任。1919年7月1日该会正式成立,王光祈为执行部主任,李大钊也是主要领导之一。少年中国学会出版会刊《少年中国》,共出4卷12期。川岛(章廷谦)在回忆录中曾说,“少年中国学会所发行的《少年中国》月刊,在当时,至少我有这样的感觉:是和《新青年》、《新潮》两个杂志鼎足而三的”^{[12]193}。《周作人日记》中相关记录有:1919年5月31日,“在守常处得少年中国学会报一本”;1919年9月18日,“得守常寄《少年中国》三册”;1919年12月2日,“得守常函,代《少年中国》托作文”;1919年12月3日,“寄少年(中国)学会及守常函”;1919年12月18日,“寄《少年中国》稿一件交守常”。其中,1919年9月18日李大钊给周作人寄的《少年中国》,应该是1卷3期,该期发表了李大钊《“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一文;周作人1919年12月18日“寄《少年中国》稿”,应指《英国诗人勃来克的思想》,刊于《少年中国》1920年1卷8号上。

第四,二人都是北京工读互助团的发起人。1919年底,李大钊、蔡元培、陈独秀等17人,发

起成立北京工读互助团。该社团与少年中国学会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工读互助运动有些骨干就是少年中国学会会员^{[12]191-192},比如王光祈。周作人、李大钊两人对工读互助团都很热心。《周作人日记》显示,1919年12月10日,“下午往校,四时半至守常处,赴工读互助团会,六时散”。根据《新青年》杂志记载,周作人也是北京工读互助团发起人之一,并捐款现洋十元^[13]。北京工读互助团在1920年3月宣告解散^[14]。

第五,周作人是新潮社的会员,李大钊是新潮社的支持者。新潮社1919年1月9日成立于北京,发起人有傅斯年、罗家伦、徐彦之等,社址设在北京大学红楼。李大钊从北大图书馆办公用房中拨出一间,用作新潮社的编辑部^[15]。周作人与新潮社关系匪浅。《周作人日记》关于新潮社的记录很多,其中与李大钊有交集的如下:1919年12月17日晚,“至香厂浣花春赴新潮社约,仲甫、守常及傅、罗、徐、俞、孟诸君共六人,玄同亦来,九时散”;1920年4月12日,“下午不上课,与守常、志希谈”;1920年6月24日,“访李守常、吴敬轩二君”;1920年9月22日,“至新潮社,又取来《点滴》五部,赠蔡先生及守常各一部”;1921年10月8日,“下午至大学,访守常,赴新潮社之会,四时半返”;1922年9月18日中午,“至北大,访守常,在新潮社逗留”。其中,1919年12月17日那条,是新潮社同人聚餐,浣花春是一家四川菜馆,位于香厂路^[16],傅、罗、徐、俞、孟指傅斯年、罗家伦、徐彦之、俞平伯、孟寿椿;1920年4月12日条中的志希,指罗家伦(1897—1969),他是江西进贤人,1917年入北京大学读文科,主编《新潮》月刊,1920年他赴美,周作人加盟新潮社,主持编辑事务^[17],《新潮》2卷4期刊“本社特别启事”,郑重宣布周作人为新加入社员;1920年6月24日条中的吴敬轩,指吴康(1897—1976),他是广东平远人,192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旋供职于北大图书馆,与罗家伦、傅斯年、俞平伯等创办《新潮》杂志^[18]。从这些日记可以看出,周作人经常先去拜访李大钊,然后去见新潮社其他同人。他在新潮社出版的译作《点滴》也送

了一套给李大钊。《点滴》是周作人在1918—1919年间翻译的小说集,分为上下两部,作为“新潮丛书”第三种出版。还有,周作人学生孙伏园,也是新潮社社员,而且曾在北大图书馆任职。1919年10月24日,周作人“引春台访守常”。这位春台,即孙伏园之弟孙福熙,他由周作人介绍也在北大图书馆工作。

三、新村运动的同志

周作人、李大钊都曾留学日本,这让双方有了更多的共同语言。这在《周作人日记》中有比较明显的反映。如:1919年10月6日,“守常函约明午宴宫崎龙介,属往,以有课辞之”。宫崎龙介是李大钊在日本留学时认识的朋友,1919年9月下旬到10月上旬,他曾访问中国的上海、北京,在北京时与李大钊有交往。《李大钊书信集》收有李大钊给宫崎龙介的邀请函,“十月七日十一时,假座香厂六味斋与同志一谈,乞光临为幸”^{[8]121},谈的就是这次宴请的事。相应地,周作人也向李大钊介绍日本友人。如,1922年5月6日,“清水君介绍鹤见、根本两君来访,又为转介绍于守常”。此处清水君,指清水安三,他和周作人、李大钊都很熟。清水安三后来写有回忆录:“我第一次见到李大钊先生是在东京早稻田山吹町的丸山传太郎牧师的宿舍……之后,时隔数年我在北京又与李大钊相见。那是在北京大学陈启修教授宴请日本来客的一次演会上……我去过李大钊家好多次。不是二十次,就是十四五次吧……受他之托,我从日本给他函购了堺利彦的《平民新闻》。”^{[19]161-163}鹤见,应指鹤见祐辅。鹤见祐辅拜访李大钊的时候是1922年,中国共产党已于一年前成立,所以清水安三在回忆录中曾这样说,“我曾带着鹤见祐辅去拜访过李大钊。鹤见断言‘中国不会共产化’,两个人的谈话变成了争论”^{[19]163}。至于根本君,尚未查到相关资料。

在日本兴起的新村运动,周作人和李大钊都很关注。有学者明确指出:

“周作人与李大钊的亲近,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1918年末日本以武者小路实笃为首的白桦派作家曾积极地鼓吹‘新村运动’……这个带

有鲜明的空想社会主义色彩的新村运动,对秉性害怕斗争,害怕暴力而又向往社会改革的周作人,自然有极大的吸引力,他曾经发表过在中国最早介绍‘新村’的文章《日本的新村》……正在探寻着救国救民道路的一些中国早期的共产党人却支持了新村运动。李大钊就是坚决的支持者之一。”^[20]

1918年,日本作家武者小路实笃创办《新村》杂志,宣传新村主义。周作人是第一个介绍日本新村运动的中国人。早在1919年3月,周作人就在《新青年》6卷3号上发表《日本的新村》。1919年10月,周作人在《新潮》2卷1号上发表《访日本新村记》。周作人本人还是日本新村会员。他说:“从杂志上得知支那已有三位新村会员,很高兴。但北京目前只有我一位。”^{[21]8}1920年2月,由周作人主持的新村北京支部成立。李大钊当时对新村运动一度热情很高,和周作人互动较多,堪称新村运动的同志。1919年8月17日,李大钊在《每周评论》35号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提到新村主义。1919年9月,李大钊发表《“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其理想中的“少年中国”有着新村的影子^{[21]34}。1920年12月8日,《民国日报·批评》出版“新村号”。在这一期专号上,李大钊发表了《欧文 Rober Owen 底略传和他底新村运动》,周作人发表了《读武者小路君关于新村的著作》。新村运动是周作人与李大钊的共同关注点,这在《周作人日记》中也有反映:1919年8月14日,“晚得八月份《新シキ村》一册、守常十三日自昌黎五峰山函”;1920年4月28日,“得守常函。下午往大学。访守常,以新村介绍函交徐彦之君”;1920年7月1日,“守常函介李君来,属为介绍往新村”。这些日记说明,周作人不仅订阅了日本《新シキ村》杂志,还介绍中国人去日本新村运动所在地参观,而李大钊也通过周作人介绍他人去参观。1920年7月1日那条日记中的李君,应指李宗武,他是北京大学游日学生团成员,也是向中国介绍新村运动的重要人物之一^{[21]23-26}。日本新村运动人士对周作人高度赞许,“我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语

言来感谢把新村的存在介绍给中国、把新村的精神传达给中国人、把青年学生介绍给我们的周作人兄的热情与厚意。可以说,正是因为有了周作人兄,新村才在事实上迈出了跨越国境的第一步^{[21]9}。周作人、李大钊积极参与的北京工读互助团,就是在日本新村运动影响下成立的。不过,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一步传播,加上日本新村运动也走了下坡路,周作人本人也不大宣传新村运动了^[22]。与此同时,李大钊成为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

此外,周作人、李大钊对俄国革命也有过共同的关注。正如有学者指出:

“周作人一直是《新青年》的热烈拥护者和积极参与者,李大钊这时已经发表了《庶民的胜利》等一系列介绍俄国革命的文章。而周作人在这一时期对俄国革命也表示出极大的热情,他在《新青年》上发表一系列介绍俄国文学作品的文章,并准备到俄国去(1918年4月26日《周作人日记》中记道:“上午拜访蔡先生说明往俄事。”)。他还在新诗《偶成》之二中歌颂革命后的俄国。”^[23]

而且在上文也提到,在李大钊任编辑的《新青年》6卷5号(即“马克思研究专号”)上,周作人(署名起明)发表了《俄国革命之哲学的基础

(下)》,说明他对俄国革命确实很关注。

四、结语

综上,在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牺牲之前,周作人在日记中一共记录了45条与李大钊有关的内容,集中地分布在1919—1922年(如表1所示),其中,1919年22条,1920年18条,1921年3条,1922年2条。1923—1927年无相关记录。李大钊牺牲后,《周作人日记》中再次出现关于李大钊的记录。从以上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周作人与李大钊的往来只维持了短短的4年,而且交往频次呈递减趋势,后两年交往次数更是断崖式下跌,直到最终断了往来。要而言之,在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个同一战壕短暂合作之后,特别是从1921年开始,周作人与李大钊渐行渐远。

笔者认为,《周作人日记》中关于李大钊的记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目前,学界在研究李大钊生平思想时已开始利用《周作人日记》中的资料,但尚未充分利用。比如,对于上述整理的45条记录,在李大钊研究的重要成果2009年出版的《李大钊年谱长编》中只引用了9条,其中一条日期还存在错误。从这个角度看,系统整理《周作人日记》中的相关记载、梳理“五四”前后周作人和李大钊的交往过程,对深化研究李大钊此时期的经历和思想有着重要意义。

表1 《周作人日记》中关于李大钊的记录(1919—1922年)

日期	内容
1919年3月22日	访李守常君,交杂志会费二元六角。
1919年3月23日	得李守常君函。
1919年5月31日	在守常处得《少年中国学会报》一本。
1919年6月6日	又至文科访守常,交《每周评论》稿。
1919年6月25日	寄守常函。
1919年7月24日	上午寄北京函、守常函。
1919年8月14日	晚得八月份《新シキ村》一册,守常十三日自昌黎五峰山函。
1919年9月8日	访守常。
1919年9月18日	得守常寄《少年中国》三册。
1919年9月26日	访守常。
1919年10月6日	守常函约明午宴官崎龙介,属往,以有课辞之。
1919年10月24日	引春台访守常。
1919年10月31日	从守常借《劳动》杂志合本一册。
1919年11月10日	还守常《劳动》一本。
1919年11月18日	下午访守常。

续表

日期	内容
1919年11月27日	寄仲甫稿二件、守常函。
1919年12月2日	得守常函,代《少年中国》托作文。
1919年12月3日	寄少年学会及守常函。
1919年12月10日	下午往校。四时半至守常处,赴工读互助团会,六时散。
1919年12月17日	晚至香厂浣花春赴新潮社约,仲甫、守常及傅、罗、徐、俞、孟诸君共六人,玄同亦来,九时散。
1919年12月18日	寄《少年中国》稿一件交守常。
1919年12月31日	上午得守常贺片,下午寄守常贺年片。
1920年2月3日	访守常。
1920年3月22日	下午访守常,四时返。
1920年4月10日	往校。访守常。
1920年4月12日	下午不上课,与守常、志希谈。
1920年4月28日	得守常函。下午往大学。访守常,以新村介绍函交徐彦之君。
1920年5月7日	往大学,访守常,取来《日华公论》五月号一册。
1920年6月24日	访李守常、吴敬轩二君。
1920年7月1日	守常函介李君来,属为介绍往新村。
1920年7月12日	又至大学,访守常,午返。
1920年7月20日	上午往大学。访守常。
1920年9月22日	至新潮社,又取来《点滴》五部,赠蔡先生及守常各一部。
1920年10月1日	下午往大学,访守常。
1920年10月5日	往大学。致守常函。
1920年11月10日	下午往大学。访守常。四时返。
1920年11月16日	得守常函。下午往大学。访守常。
1920年11月17日	寄守常函。
1920年12月16日	下午往大学,访守常,四时回家,得《新青年》十册。
1920年12月19日	往大学,寄守常函。
1921年7月21日	守常、秣陵、士远、夷初、翼庭诸君来访。
1921年10月8日	下午至大学,访守常,赴新潮社之会,四时半返。
1921年11月2日	上午往大学,访守常。
1922年5月16日	清水君介绍鹤见、根本两君来访,又为转介绍于守常。
1922年9月18日	午至北大,访守常,在新潮社逗留。

参考文献:

- [1] 周作人. 周作人散文全集(9)[M]. 钟叔河, 鄢琨, 编制.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 [2] 周作人. 周作人散文全集(13)[M]. 钟叔河, 鄢琨, 编制.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663-664.
- [3]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 李大钊年谱[M].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1: 59.
- [4] 上海新闻志编纂委员会. 上海新闻志[M].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0: 341.
- [5] 周佳荣. 近代日人在华报业活动[M]. 长沙: 岳麓书社, 2012: 117.
- [6] 图书馆登录室第一部布告[N]. 北京大学日刊, 1920-10-01(4).
- [7] 张菊香, 张铁荣. 周作人年谱(1885-1967)[M].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9: 177.
- [8] 李大钊. 李大钊书信集[M]. 周芳, 李继华, 宋彬, 校注.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5.
- [9] 鲁迅. 鲁迅全集: 第15卷[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440.
- [10] 周作人. 周作人文选(1945-1966)[M]. 钟叔河, 选编. 广州: 广州出版社, 1996: 257.
- [11] 周作人. 周作人散文全集(12)[M]. 钟叔河, 鄢琨, 编制.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724.

- [12]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 五四运动回忆录[M].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3.
- [13] 工读互助团募款启事[J]. 新青年, 1920, 7 (2).
- [14] 夏征农, 陈至立, 熊月之, 等. 大辞海·中国近现代史卷[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3: 465.
- [15] 刘维薇. 李大钊北京十年: 学会篇[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8: 260.
- [16] 北京游览指南[M]. 北京: 新华书局, 1926: 61.
- [17] 张耀杰. 北大教授与《新青年》[M].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4: 358.
- [18] 顾明远. 中国教育大系: 历代教育名人志[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15: 707.
- [19] 清水安三. 朝阳门外的清水安三: 一个基督徒教育家在中日两国的传奇经历[M]. 李恩民, 张利利, 邢丽荃, 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 [20] 张菊香. 红楼奠基的深情——周作人与李大钊[J]. 党史纵横, 1994(7): 8-10.
- [21] 赵泓. 中国人的新村梦[M].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4.
- [22] 张菊香, 张铁荣. 周作人研究资料(上)[M].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4: 157.
- [23] 周即平. 李大钊与周作人[M]//中国李大钊研究会. 李大钊研究论文集.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9: 404.

(责任编辑: 李秀荣)

(上接第 24 页)加了对广大贫苦民众的同情。

儿童是国家的未来, 是民族的希望。李大钊培养以实现国家独立、人民解放的后备力量为目标, 以培养人的全面发展为价值取向, 提出了丰富的儿童教育理论并付诸实践, 对于今天的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仍具有重要意义, 是一份宝贵遗产。

参考文献:

- [1] 李大钊. 李大钊全集: 第 5 卷[M]. 北京: 人

民出版社, 2006.

- [2] 李大钊. 李大钊书信集[M]. 周芳, 李继华, 宋彬, 编注.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5.
- [3] 李大钊. 李大钊全集: 第 4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6.
- [4] 李星华. 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1.
- [5] 朱文通. 李大钊年谱长编[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责任编辑: 李亚平)